

Meijie
Shenfen Chongjian

媒介身份重建

——全球传播与国家认同建构研究

刘国强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四川外语学院2009年度学术专著后期资助项目

媒介身份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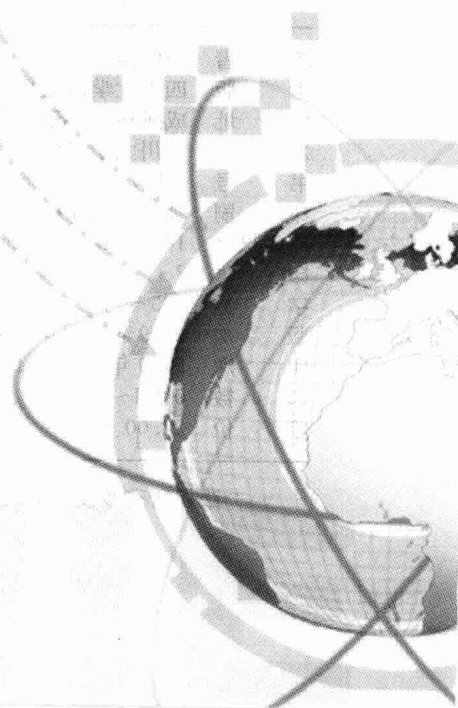
——全球传播与国家认同建构研究

MEIJIE SHENFEN CHONGJIAN

刘国强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 凯(特邀) 徐 燕

责任校对:王 冰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介身份重建:全球传播与国家认同建构研究 / 刘国强著. —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614-4285-2

I. 媒… II. 刘… III. 传播媒介—研究 IV. 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3196 号

书名 媒介身份重建

——全球传播与国家认同建构研究

著 者	刘国强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285-2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7
字 数	18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1 500 册
定 价	22.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 scupress. com. 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秦志希

序

国强的博士论文《媒介身份重建——全球传播与国家认同建构研究》出版了，我在此对他所取得的学术成果表示祝贺！虽然只是一本薄薄的册子，在某些方面还嫌论述不深，但该书在近年已成学术热点、论著蔚为大观的国际传播研究领域，从价值冲突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出发，力图对国际传播领域中的价值立场进行学理性的分析，其中凝聚了国强在学术探索上的艰辛努力，体现了作者不愿蹈袭前人的求新精神，我认为值得一读。

荀子提出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分，在于“人能群”。而国家无疑是“群”的最重要形式和向度。中国自古以来就从“忠君”这一基本政治伦理和“平胡虏，振华夏”这一民族心理两个方面建造了国家主义的价值体系，国家的观念是关乎善恶是非的首要问题。

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已经不是传统的帝国，世界也不是以往的“天下”。国际社会联结日益紧密，形成了全球共同利益；新的传播技术飞速发展，带来了信息的全球流动和全球共享；旅游和移民的大量增加，造成了文化交流和冲突日趋频繁，现代国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所产生的文化认同张力成为世界性的共同话题。我曾著文提出，去区域化刺激国家采取相应措施以强化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不独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包括加拿大、法国等发达国家也都采取一系列的政策策略以抵御美国的文化“殖民”。

也正因为国家、地方势力的作用，当今文化全球化正伴随着本土文化的意识觉醒与崛起。再就文化主体而言，文化全球化往往造成人们的一种文化迷茫与漂移感，这又必然刺激人们在地域意识与归属意识中去寻求慰藉，使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断确认，返回文化的主体性，从而催促主体的文化自觉。我们由此可以发现，正是全球化的去区域化逻辑在促使地域、民族文化的自觉。

由此，在传统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传播之外，跨文化传播和全球传播也已成为新的研究领域。国强的论文，能够以跨学科的视野关注这一前沿性的话题，以理性的态度研究传媒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作用机制，试图在国际传播领域重建媒体的主体性，这对当前过于注重功利价值的国际传播领域来说，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比如，近年关于国家形象传播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国强并不赞同单方面夸大媒介在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中的作用，但作为“能群”的个人，又都天然地具有对群体身份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荣誉感，这使国家形象成为一种群体的情感认同形式。国强从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心理两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并由此提出国家形象的形成过程和传播模式，这就使他的研究有了一些新意。

但关于学术，我其实并不想说太多。这是一个功利的时代，我自己有时也不免自问：学术何为？古人有云，著书皆为稻粱谋，能叨列“三不朽”者，非圣即贤。但我想，大多数读书人恐怕是介于功利与理想之间的吧？不敢奢望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但也不满足于以文媚世而给口腹，存忧世之心，畅欲辩之言，即不能妄求有补于世，也必能自问无愧于心。

之所以说这些，是有感于国强写作这篇论文时所体现出来的关注现实的社会责任感。国强做过多年的电视新闻工作，主要讲授的课程也是广播电视方面的。在确定毕业论文选题前，他曾想做一篇电视实务方面的研究，这于他恐怕更“名正言顺”，也会更加得心应手。但他有感于当前民族主义走向的褊狭，有感于国

际传播研究中的价值偏差，而提出要联系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引人注目的大众传播现象，研究媒体在建构国家身份中的作用，辨析其在当今文化融合和冲突的张力下的价值规范。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以致选题迟迟不能确定。他当时还在湖南大学工作，家里新添了一对双胞胎宝贝，我倒觉得他不必过于性急，安顿好工作和生活，再推迟一两年把论文做好，也未尝不可。但他只延期半年，就拿出了初稿，论文整体上还是让人满意的。我想，这与他不错的文史积累也不无关系。

国强是一介书生，喜欢读书，喜欢独立思考。他身上有传统士子文人的忧患意识，有“迂腐”秀才说真话认死理的劲头，也有现代学人的开阔视野。他为学博杂，不肯死守在新闻传播学的框框里，这使他能写出这样一部超越传播学范畴的专著来。当然，回到学术的角度来说，博杂也在某种程度上会带来杂而不深、不专的问题。

这在著作的最后一部分，即关于媒体在全球传播时代建构国家认同时所面临的价值冲突部分体现得最为明显。显然，这是整个论述的基础，但它所涉及的价值范畴过于庞杂，涉及国家价值、商业伦理、媒介伦理等价值范畴，在短短的篇幅中讨论其复杂的价值关系问题，是几无可能做好的事情。国强虽然努力地为我们呈现价值冲突的各种向度，但论述不够深入。不过，不管怎样，这终究能引发我们的些许思考。

国强的著作体现出学人特有的理性态度。用福泽谕吉的话说，他对于群体身份认同下个人主体性的“感溺”现象是警惕的。在这本书之前，正好有关于国家的书在畅销，畅销书追求的是诉诸最多数人的情感，甚至包括一些学者也在其严肃的论著中追求“不高兴”的效果，其背后的商业逻辑则昭然若揭。可见，通往真理的道路上，情感是最能遮蔽双眼的因素，尤其是当情感上升到神圣的美德高度以后。而国强的理性表达，可能于时宜并不讨巧，但于学理而言是严肃认真的，于国家而言也应该是有利的。毕竟，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我们对待文化的交融和变迁

应该秉持更加宽容理性的态度，这样才更有助于我们的开放和学习，更有利于我们这样的文明古国或曰传统帝国的现代化转型。按费孝通先生的教导，我们在“各美其美”的基础上，还应该学会“美人之美”，进而才能“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近十年来，国际传播学的研究在中国发展很快，但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我们仍然存在研究议题狭窄、研究方法单一、理论来源单薄等问题。当前世界国际传播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了，美国的国际传播协会已经举办了 50 多届年会，协会下设近 20 个专业研究方向，包括信息系统、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政治传播、发展传播、公共关系、女性研究、同性恋研究等。分类的精细使得这一领域也不免让人产生隔行如隔山之叹。于此而言，我们的国际传播学研究需要在研究范围、方法等方面继续有所发展和突破，也确实大有发展和突破的余地。我希望国强能继续努力，取得新的成绩。我也愿以此与国强共勉。

是为序。

2009 年 6 月于珞珈

目 录

第一章 全球化与传播的全球化.....	(1)
一、全球化及其多维阐释.....	(2)
二、传播的全球化.....	(16)
三、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的转型.....	(27)
四、全球传播景观：真实抑或虚幻？	(38)
第二章 全球传播下的国家认同危机.....	(52)
一、什么是国家认同.....	(52)
二、全球传播下的国家认同危机及其表现.....	(59)
三、全球传播下的媒介与国家关系.....	(73)
第三章 媒介建构国家认同的作用机制.....	(78)
一、国家形象传播：作为国家认同的双重机制的考察	(78)
二、制造认同：集体记忆与自我想象.....	(94)
三、案例分析	(136)
四、全球传播时代的他者塑造.....	(149)

第四章 全球传播时代媒介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价值冲突	
.....	(166)
一、全球价值与国家价值.....	(166)
二、媒介价值与国家价值.....	(171)
三、个人价值与国家价值.....	(179)
四、商业价值与公共价值.....	(184)
结语：在多元主义认同中重建全球传播的媒介伦理.....	(188)
参考文献.....	(193)
后 记.....	(209)

第一章 全球化与传播的全球化

这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与先辈相比，我们接触到了那么多他们闻所未闻的新奇事物，我们看到了那么多他们从未见过的异域风情，我们创造出了那么多他们不曾创造的技术产品，以至于很多人要为掌握它们的正确使用方法而烦恼。

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国家、政治、媒介、伦理道德，许多我们原来习以为常的概念，其结构、形式、功能和意义，都在发生着改变。

这是一个弥散的时代，各种观念、价值、文化在冲突和寻求共生的过程中失去了原有的神圣和崇高。确定性和唯一性被搁置之后，似乎一切变化都有了其合法依据，正如米歇尔·伯曼所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变动不居已经成为唯一不变的法则，它是否也必然成为观念追随现实的无奈选择？

我们仿佛被一道激流所裹挟，当我们试图看清自己所处的方位的时候，却早已经漂离了原来的位置。是否有一块屹然不动的礁石，供我们的灵魂暂且栖息？因此，我们是谁，我们将向什么方向改变等问题在此时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可以说，关于我们自身，我们仍然需要寻求一种确定性，寻找一种根性，以便从中发现生活的意义。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和认同问题会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

对本书来说，变动中的国家或民族，古老的文化传统和现代政治治理机制，在当下如何产生新的效忠形式，以及媒介在其中

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伦理规范，正是其旨趣所在。

一、全球化及其多维阐释

（一）全球化及其进程

全球化是近年来的学术热点。对其进行理论阐释的多种维度，也是基于技术进步的现实场景。但在这个词语的使用上，却已经被过度阐释得漫无边际了。从词源学上看，“全球化”一词其实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已经出现了。有资料表明，早在 1944 年，西方人的著述中就已出现 globalization 一词，到 1961 年，该词被正式收录到权威版本的韦伯斯特词典之中。

但自觉地将作为一种理论进行阐释，应该还要稍晚一些。1962 年，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M. McLuhan）提出“地球村”的概念，被认为迈出了全球化理论的重要一步。他认为：印刷媒介使人们彼此疏远，而电子媒介却使人们更加相互依赖，电子通讯和快速交通的加速作用，将人类经验的所有方面都汇聚到一起，使我们同时感到和接触到远距离外的种种事件和客体。工业文明的中心——边缘结构在同步性、同时性和瞬间性面前消失，最终把世界塑造为一个“崭新的地球村”^①。从媒介的角度看，麦克卢汉强调的更多的是形式而非内容，其对技术造成的影响在引起争议的同时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他宣称电子媒介将“取消时间和空间”，电子传播技术将把共享的人类情感和经验联系、统一在一起。

也有人认为是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 1969 年《两代人之间的美国》一书中第一个正式提出“全球化”概念的。他认为我们已不需要谈论“帝国主义”，因为世界正在向全球化社会的方向发展，而最能证明这种形式的社会的完美典型就是美国。为什么会是美国？这是因为美国的传播网络最多，遍及全世

^① Marshall McLuhan,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2, pp. 31~58.

界，所以美国的社会是未来社会的原型。今后解决世界冲突的外交战略将不是“大炮外交”，而是“网络外交”了，它的模式更加灵活和实用。布热津斯基还设想，在美国国务院之外再开设一个全球事务院，与前者平起平坐。^①

在东西冷战之时，布热津斯基提出全球化的设想，其目的在于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以推销美国生活方式来同化敌方阵营，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事实上，全球化也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不同国家，不同利益集团都按照自己的设想对它进行阐释，以达到通过它而影响和控制对方的目的。

甚至还有人认为，“全球化”一词最早是由一个名叫泰奥多尔·莱维特（Theodore Levitt）的学者于1985年发明的。他在《哈佛商报》上《谈市场的全球化》一文中，以“全球化”这个词来形容此前20年间国际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这是典型的经济视角。莱维特认为，全球化只是涉及国际贸易，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管理以及它们在世界各地建立工厂并销售自己的产品的能力问题。^②

从这些关于全球化的最初表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个词语是基于当前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传播等方面联系日益紧密的现实而提出来的。难怪一些学者追溯其起源时，要将其上溯至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第一步。也许，当麦哲伦、哥伦布们站在欧洲的西海岸，眺望云水茫茫的大西洋时，他们试图迈出的那一小步，正是全球化的第一步。血腥的掠夺、残酷的战争伴随着浪漫

① [法]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传播全球化思想的由来》，陈卫星译，载《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

② 施光泉：《全球化与价值冲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的鲁宾逊式的英雄童话，全球性交往就这样开始了。“类似于‘全球化’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内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出现过程。当然这一过程是从1492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始的。”^①

哈维还指出全球化过程中有四个转变异常突出：“（1）20世纪70年代早期首先在美国出现的取消金融管制是对当时国内发生的滞胀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被迫采取的反应。（2）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的科学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及改进为探索世界经济近期发生的转变提供了重要中心。（3）媒体和通讯系统以及最重要的、所谓‘信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生产和消费组织并带来了全新的需求和需要定义。（4）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周期性发生的另外一些转变中，商品和人员的流动成本和时间也有所下降。这就把各种活动从以前的空间约束中解放出来。”^②

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逐渐成为人们挂在嘴边的熟语，特别是90年代后期，在各种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全球化成了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关键词，关于全球化的理论表述可谓汗牛充栋，但阐释的维度和价值立场的不同，使得它成为各种政治、文化、经济力量博弈的焦点。如何界定全球化，它的影响和后果如何，它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怎样，全球化是否是西方化或美国化的代名词等问题就是本书研究的焦点。

（二）全球化的多维性

在众多学术论著中，有许多词语与“全球的”（global）一词相近，如“国际的”（international）、“超国家的”（transnational）、“跨国的”（multinational）、“世界性的”（worldwide）等，它们在许多场合常常可以互换，但在另外一些场合也有细微的区别。如

① [美]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② [美]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1页。

“国际的”一词常用以指称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超国家的”一词则相反，通常是指这样一些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高于或超越国家的限定和控制。联合国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合作也通常用“超国家的”一词，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希望引起人们对其可能拥有的超越国家的权力加以关注。事实上，“全球化”本来就是与“民族国家”相对应的概念，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暗含“超国家”之意，但它远比简单的“超国家”复杂。而“跨国的”一词，偏重于对企业运作或信息流动跨越国家界线的静态表述，有较强的可视性和客观性，因此，它的使用较少有争议。^①

概念上的歧义和语义上的滥用，确实给我们的理论表述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对这一现象的不同理解。在关于全球化理论的众声喧哗中，要澄清这一关键词的含义殊非易事。这里只能简单引述几个经典的表述。

赫尔姆（Helm）和索伦森（Sorensen）在关注“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是否正在促进一种新的全球或世界秩序时，提供了一个简洁的定义，即将其视为“跨越国界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关系的增强”^②。这个概念在有关社会变革的动力方面，引入了历史的探讨。通过这个定义，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政治疆域的渗透力变得更加突出。同时，它也强调了全球化并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

对于世界理论体系的开创者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来说，全球化代表着以全球劳动分工连接在一起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胜利。他以其核心—边缘模式，直接从经济角度关注资本积累的流动过程产生的不平等。这一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资本积累的逻辑驱动，在一个以权力和占有空间划分的等

① 可参阅[澳]罗伯特·霍尔顿《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倪峰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页。

② Helm. H-H. & Sorensen. G. (1995), *Whose Order: Uneven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ould: Westview Press.

级制度中,国家和地区占有特定的位置,同时国家和地区被进一步划分为作为经济中心的西方世界、处于外围受到剥削最为贫穷的第三世界,以及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半边缘世界。另外,与此相关联,也划分出世界的政治中心和边缘。^①

在全球化理论的早期,最受人瞩目的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因此,世界作为一个单一社会的发展前景,常常是界定全球化的重要视角。奥布罗(Albrow, M.)因此将全球化定义为“所有那些将世界各地的人们混合融入一个单一全球社会的进程”。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类”第一次成为“全球主义”意义上的“集体角色”。可见奥布罗对“全球主义”的定义明显带有世界单一化的道德理想:“它将50亿人的真实世界当作关怀的目标,将整个地球看做是自然环境,每一个人都是世界性的公民、消费者和生产者,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通过集体的行动解决全球性的问题。”^②

罗布森(Roland Robertson)的定义与此相近,但也许更加有效实用。罗布森的全球化理论是从“文化”的视角阐释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性的,他坚持“走向世界统一性的趋势无论怎样都是不可更改的”^③,因而必须“与作为整体的世界缔结和约”^④。他认为“全球化”是指“世界的缩小以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这样一种意识的增强”^⑤。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定义比奥布罗的定义更广泛,它既包括了有助于缔造一个单一相互依存世界的经济组织和通信技术,也包含了对世界是一个单一场合的理解。罗布森接着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对全球化进行了研究,强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及其解释。他超越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对立,第一次引

① [澳] 罗伯特·霍尔顿:《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倪峰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② Albrow, M. (1990), “Introduction”, in Albrow and King, E. (eds) *Globalization, Knowledge and Society* (London: Sage), p. 8.

③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p. 26.

④⑤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p. 25.

用了“全球本土化”(globalization)和“本土全球化”(local globalization)的概念,对全球与本土之间的相互渗透进行了更深入的观察,认为全球化社会的这一特征,不仅在商业活动中十分明显,在社会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也一样。全球化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一个单一的全球领域得以出现和形成。然而,它又不是这个领域唯一的构件。按照罗布森的说法,其他一些构件还包括特殊的地理位置、民族、社区以及个人。^①不管怎样,罗布森仍是将全球化理解为一种单一状态或最终状态,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将其与奥布罗一起列入怀疑论者和极端全球主义者之列,认为他们的想法带有一种诱人的理想主义色彩,确实颇具吸引力。但现实中与全球化相反的地方化趋势,以及各种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不免使人对其产生疑虑。赫尔德认为,他们的看法“忽视了全球化在社会生活不同领域中体现的不同形式”,而对此而言,“全球化最好被视为一个高度分化的过程,体现在社会活动的所有关键领域中”。^②

赫尔德等因此把全球化定义为:“一个(或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可以根据它们的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衡量——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和权力实施的网络。”^③他解释说:“在这里,流动指的是物质产品、人口、标志、符号以及信息的跨空间和时间的运动;而网络指的是独立的能动者之间有规则的或者模式化的交往、活动的接点(nodes)或者权力的地点。”^④

① 参阅[澳]罗伯特·霍尔顿《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倪峰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7页。

② [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7页。

③ [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④ [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页。

赫尔德说,对这些概念进行更精确的定义,关键是要表明,全球化在这里与更有空间限制的过程(如本土化、国家化、区域化、国际化)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复合和动态的关系。一方面,像区域化这样的过程能够创造必要的经济、社会以及物质基础,它们推动着全球化的深入。在这方面,经济区域化并不是贸易和生产全球化的障碍,而是推动力。另一方面,这样的过程如果没有鼓励全球化的过程,那么也能够限制全球化。^①

显然,赫尔德等对全球化的定义,更加深切地理解了全球化的多维度及其影响的多重性,并将全球化与种种地方化特征联系起来,试图揭示其复杂的关系。

而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基础之上的全球化,其传播学意义也逐渐受到关注。事实上,关于“全球化”的争论始终都围绕着它对“时间—空间”关系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如何理解自身,还有他们和某些特定集群、地域的关系。^②一些学者由此界定全球化。这似乎又回到了麦克卢汉的理论,但显然要比他走得更远。由此定义全球化,可以将其描述为“不断增强的相互依赖”、“距离遥远的行为”、“时空的压缩”等等。

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的定义很有代表性:“人们对全球化的基本认识是说,全球化是现代世界的一种经验主义的状况,我将把它称之为是复杂的联结。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说,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构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而全球化指的就是快速发展、不断密集的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的网络系统。”^③

这样,“从最简单的意义上来说,全球化就是全球性相互联

① [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② 凯思·内格斯、帕特里亚·罗曼—维拉奎兹:《全球化与文化认同》,见[英]詹姆斯·库兰、[美]米切尔·古尔维奇编《大众媒介与社会》,杨击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315页。

③ [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